

---

---

# 回眸战后 80 年的中日关系：官民互动与高层引领\*

宋成有

**内容提要：**从 1945 年二战结束至今，中日关系走过了 80 年的发展历程。1945 年日本战败投降、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及 1952 年日本结束被占领状态、恢复主权外交，构成了两国关系发展的前提条件。1952 年至 1972 年，两国关系经过 20 年间的三度起落，通过“以民促官”，最终实现了邦交正常化。1972 年至 1992 年，两国关系全面发展，多领域合作，互利共赢。1993 年至 2012 年，两国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有增无减，进入摩擦不断、求同存异的成熟时期。2013 年以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中国提出的对外发展倡议为中日关系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如何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成为两国共同面对的重要课题。

**关键词：**中日关系 以民促官 邦交正常化 四个文件 高层引领

**作者简介：**宋成有，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中图分类号：**D822.3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874 (2025) 03-0138-23

中日关系自近代以来就是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改革开放后更是备受关注且相关研究成果累累。20 世纪 80 年代，中国日本史学会（1980 年）、东北地区中日关系史研究会（1980 年）、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1984 年）等多家民间学术研究团体先后成立，并致力于出版刊物，举办学术研讨会，开展对外交流。自此，多部研究战后中日关系的学术专著出版<sup>①</sup>，在战后日本外交史

---

\* 感谢《日本学刊》编辑部和匿名审读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文中若有疏漏和不足概由笔者负责。

<sup>①</sup> 参见张暄：《当代中日关系四十年（1949—1989）》，北京：时事出版社，1993 年；林代昭：《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年；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史（1945—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张篷舟：《中日关系五十年大事记》，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 年；刘江永：《中日关系二十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年；刘江永：《中国与日本：变化中的“政冷经热”关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年；孙乃民：《中日关系史》（三卷本），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刘建平：《战后中日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 年；等等。

的诸多专著中，中日关系史也是其“重头戏”<sup>①</sup>。相关学术论文更是不胜枚举，还有欧美、日本学者相关专著的译作等相继问世。在这些学术成果的研究基础上，本文拟聚焦于探讨三个阶段中日关系的发展轨迹：中日一波三折复交过程中的以民促官、复交后中日关系从热络走向成熟以及 2013 年以来中日关系发展进入新阶段。时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回顾战后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总结必要的经验教训，对推进国家关系、展望未来不乏启示意义。

## 一、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一波三折（1945—1972 年）

基于中日关系总体态势演变的综合考察，自 1952 年起，两国首先走过了以民促官、推动邦交正常化的历程。但说到战后 80 年间的中日关系，又不能不谈及 1945—1952 年这段战后初期的历史。1945 年 8 月 14 日，日本政府电告盟国投降；同年 9 月 2 日，举行日本正式签署投降书的仪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宣告结束。横行半个世纪的“大日本帝国”崩溃，为重建中日关系奠定基础。美国对日本实施单独占领，积极推进非军国主义化和民主化改革，并剥夺了日本的外交功能。中国虽然赢得了近代以来首次反抗外敌侵略的胜利，但因 1946 年 6 月蒋介石挑起内战而再度陷入剧烈动荡。1949 年 1 月，三大战役从根本上摧垮蒋介石的统治。9 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庄严宣布：“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sup>②</sup>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构成中日两国关系不可或缺的一极。

此时，世界正处于冷战初期，东西方阵营展开对抗。日本首相吉田茂奉行“对美一边倒”方针，在 1948 年 8 月致信麦克阿瑟，宣称为了阻止“共产主义洪流”，需要把日本打造成反共的“防波堤和远东的稳定力量”。<sup>③</sup> 两个

<sup>①</sup> 参见吴学文：《日本外交轨迹：1945—1989》，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 年；宋成有、李寒梅等：《战后日本外交史 1945—1994》，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 年；冯昭奎、刘世龙等：《战后日本外交史 1945—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等等。

<sup>②</sup>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政协网，1949 年 9 月 29 日，<http://www.cppcc.gov.cn/2011/12/16/ART11513309181327976.shtml> [2025-05-10]。

<sup>③</sup> 猪木正道：《吉田茂的执政生涯》，江培柱、郑国仕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6 年，第 308 页。

月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NSC13/2 文件”<sup>①</sup>，决定对日本停止非军事化政策、放弃索赔，转而全力复兴日本经济。1949 年 10 月 3 日，吉田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公开敌视并拒绝承认新中国。1950 年 6 月朝鲜战争爆发，10 月中美兵戎相见，日本成为美军距战场最近的后勤保障基地，其战略价值凸显。

1951 年 9 月，美国主导召开旧金山对日媾和会议，并缔结了“旧金山和约”，宣布结束对日作战状态，恢复日本主权。吉田茂在会上发表演说，指责“共产主义的压迫与专制”、在远东“公开发动侵略且日益逼近日本”，<sup>②</sup>再次把矛头指向新中国，要求美军留驻日本。在“旧金山和约”签订的当天，日美两国签署《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将驻日美军基地合法化，美军可应日本政府请求镇压其国内暴动或骚乱。同年 12 月，吉田内阁又遵照美国的意愿公开“吉田书简”，选择“中华民国”作为媾和对象。1952 年 2 月《日美行政协定》签订，规定驻日美军的地位及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4 月 28 日，三个条约同时生效，标志着“旧金山体制”形成，即美国虽结束对日占领但驻军合法化、日本虽恢复独立但主权并不完整、美日虽结为同盟但呈现美主日从的关系。当天，吉田内阁与台湾蒋介石当局签署“日华和约”，前者以“主权有限”承认台湾当局，后者放弃战争赔偿。“日华和约”表明吉田内阁追随美国、敌视新中国的外交立场，给蹒跚起步的中日关系制造了巨大障碍。

经过战后初期美国对日实施的民主化改革，一方面，日本在议会民主制度下，成年国民享有普选权，选民通过多元化政治投票决定政党轮替，而执政党内部派系间的博弈又决定了首相人选，民心民意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日本通过实施以解散财阀、经营者革命和农地改革为核心的战后改革，成功拓展了国内市场，为经济复苏注入了强劲动力。随着朝鲜战争给日本带来“特需景气”，其国力得以恢复并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同时，中国市场也展现出一定的吸引力。在反省战争、反军备和反对美军基地的浪潮中，坚持睦邻友好的和平运动深刻影响了日本外交。1949 年成立的中日贸易促进会、中日贸易促进议员联盟、中日贸易协会和中日友好协会等友好团体，率先开展民间交往，推动经贸与文化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压舱石。

1952 年日本国会议员高良富、帆足计等人访华并签订《中日贸易协定》，打开了中日民间直接贸易的渠道，启动经贸领域“以民促官”。1953—1954

① “Recommendations with Respect to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Japan”, *FRUS*, 1948, VI, pp. 857–862.

② 吉田内閣刊行会編『吉田内閣』、吉田内閣刊行会、1954 年、419 頁、420 頁。

年，中日红十字会实现互访，中方协助数万名日侨回国，并公布了在押日本战犯名单，深深触动了包括皇室成员在内的日本社会各界。1954 年 10 月，多个日本访华代表团齐聚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五周年的庆祝活动。同年 12 月，旨在推动恢复日中、日苏关系的“国民会议”在东京成立，日本国内要求对华友好的舆论压力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吉田内阁赤裸裸的反华方针愈发不得人心，最终只得作出对新中国“既不交往，也不交恶”的尴尬表态。

1955—1957 年，鸠山一郎、石桥湛山等自民党非主流派首相先后执政，中日两国关系走出吉田茂执政时的对立低迷期，并有所发展。1955 年，鸠山内阁派遣代表团出席亚非会议，其间周恩来与高碕达之助的会晤是中日首次官方接触。新《中日贸易协定》和《中日渔业协定》的达成，为两国带来实实在在的互利。1956 年，日本商品展览会在北京和上海举行，中国领导人的亲临提振了日本企业的信心；梅兰芳率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演出，并把最后两场的收入用于救济日本战争孤儿和原子弹受害者，其善举感动了日本民众；中国政府释放在押日本战犯激发了日本社会的反思和对华友好的热情，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这一系列“人民外交”举措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展示了中国政府推动民间交往以改善国家关系的长远眼光与智慧。1956 年 10 月，鸠山一郎完成日苏复交后辞职。同年 12 月，石桥湛山内阁成立，其注重改善对华关系，但两个月后因患脑梗而辞职。

1957—1960 年岸信介执政期间，日美签订了意在体现对等地位的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进一步密切了日美同盟关系。同时，岸信介在访问东南亚国家期间，多次宣扬“中国威胁论”。其对华外交采取鲜明的反共、亲蒋的立场，较吉田茂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1957 年岸信介窜访台湾地区，公然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主张，并将台湾地区纳入日美在远东的所谓“防卫”范围。与此同时，岸政府敌视新中国，蓄意破坏《中日贸易协定》及“民间贸易备忘录”的执行，包庇“长崎国旗事件”的暴徒，最终导致 1958 年 5 月中国决定中止与日本的经贸、文化和人员往来，中日关系跌入谷底。

另一方面，针对岸内阁推行的对华挑衅政策，日本社会党于 1958 年制定了《打开日中关系的基本方针》，支持中国提出的发展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即不敌视中国、不制造“两个中国”、不阻挠两国关系正常化。<sup>①</sup> 1959 年，日本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访华，进一步重申拥护“政治三原则”，强调

<sup>①</sup> 《新华半月刊》1959 年第 7 期，第 39 页。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与此同时，自民党内石桥湛山、松村谦三等有识之士访华，推动了日本执政党内对华友好力量的发展。1960 年，在“安保斗争”猛烈冲击下，岸内阁被迫辞职，陷入僵局的中日关系出现转机。

1960 年吉田茂旧部池田勇人组阁后，致力于发展经济，同时调整岸内阁的对华强硬政策，推行“政经分离”方针，重启中日经济与文化交流，中日关系止跌升温。在以民间交往为主体的发展框架下，中日两国通过情感共鸣、文化互动与经贸合作形成合力，各界精英积极参与推动邦交正常化，推动双方关系向多层次发展。周恩来总理适时提出指导双方经贸方向的“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三位一体的“中日贸易三原则”。在池田的支持下，1962 年 9 月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率团访华，中方重申“政治三原则”和“贸易三原则”，双方达成推进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共识。同年 11 月，高碕达之助率团访华，并签订《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简称“LT 贸易备忘录”），中日交流加速发展。进入 1963 年，两国代表团互访日益频繁，1964 年又互设办事处并互派记者，双方建立了半官半民关系。

1964 年佐藤荣作出任日本首相，执政期间取得了显著成果：1967 年提出“非核三原则”，并于翌年写入自民党《核政策的基本方针》；促成了持续时间长达 53 个月的“伊弉诺景气”；1968 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超过联邦德国，成为西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970 年自动延长新《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深化日美同盟关系；1971 年与美国缔结《关于冲绳群岛及大东群岛协定》，并将钓鱼岛非法纳入“归还”范围。就对华方针而言，佐藤荣作与其胞兄岸信介如出一辙。1965 年，佐藤内阁拒绝彭真率团入境参加日本共产党代表大会，限制日本青年参加日中青年友好大联欢。1966 年，又禁止日本青年团体访华，阻挠“LT 贸易备忘录”执行，致使日立造船厂与中国机械进出口公司的货轮合同被终止。1967 年，佐藤窜访台湾地区，强调反共立场。1969 年，佐藤与尼克松发表《日美联合声明》，将台湾地区称为“日本安全的攸关方”。1970 年，与台湾当局续签“日华和约”，一再挑战中国的主权底线。在联合国层面，佐藤与美国沆瀣一气，拒绝恢复中国的合法席位。即便如此，中日友好力量也已今非昔比。日本社会党及友好团体一如既往支持中日复交；创价学会和新建的公明党日益活跃，并提出中日邦交正常化倡议。1968 年“LT 贸易”改称“备忘录贸易”（即“MT”贸易），工商界合力深化经贸合作。1971 年 10 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随即提出“中日复交三原则”。1972 年 2 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这种“越顶外交”给佐藤政权沉重一击，虽欲仓

促寻求访华以摆脱困境，却被中方拒绝，最终于同年 7 月黯然下野。

继任首相的田中角荣将中日邦交正常化列为首要外交目标，获得了日本财界和主流舆论的广泛支持。田中遵循“全方位外交”的思路，一方面，委托公明党书记长竹入义胜访华，为复交谈判铺路；另一方面，在自民党内部安抚亲台势力，访问美国争取尼克松政府的默许，同时向英法等西欧国家通报立场，并派出特使向台湾当局作出解释。最终，1972 年 9 月 25 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与外务大臣大平正芳率团访华。29 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并发表《中日联合声明》，实现邦交正常化。大平正芳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日华和约”即日起失效。至此，历经 20 年、“以民促官”的复交进程取得了历史性突破，中日关系揭开新的篇章。

综上所述，1952—1972 年间，尽管两国尚未建立正式的官方关系，但民间交往持续发展并成为推动中日复交的关键力量。中国政府对日政策长期稳定，积极推动人民外交政策，而日本政府的对华方针则因首相轮替而有所差异，导致中日关系呈现明显的“三降三升”波动轨迹：从吉田内阁时期的持续下降，到鸠山、石桥内阁时期的逐步上升，又到岸内阁时期跌入谷底，再经池田内阁时期的大幅度回升，又到佐藤内阁时期再度下跌，最终在田中内阁时期完成邦交正常化。在这一进程中，日本有识之士的作用不容忽视，比如松村谦三、石桥湛山等元老跨党派斡旋，浅沼稻次郎因主张对华友好而遭右翼刺杀，田中角荣也在访华前受到右翼暴徒的威胁。“以民促官”的曲折实践，使得中日两国复交更显珍贵。

## 二、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关系的调适与深化（1972—2012 年）

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一个改变东亚国际格局的大事件，影响深远。对中日关系而言，复交意味着双方近距离相互审视，依据国内外政策的需要，作出必要调适。40 年间，双边关系从热络走向成熟，进入不断深化、斗而不破的常态。

### （一）两国关系热络的“蜜月期”（1972—1992 年）

1972 年中日复交后，两国关系出现了 20 年热络的“蜜月期”。所谓“热络”，一方面，两国关系全面发展，首脑外交频繁，文化学术交流普遍展开，民众友好感情快速升温；另一方面，即使出现摩擦，两国政府也能在互动中找到化解的办法，确保合作热度不减。两国关系之所以“热络”，从根本上说，与 1972 年《中日联合声明》和 1978 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确立的指

导原则及奠定的政治基础密切相关。

《中日联合声明》规定了处理两国关系的原则。第一，一个中国原则，即“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第二，台湾为中国领土原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日本政府对此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同年 11 月，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在国会表明日本政府对于“台湾条款”的统一见解，即台海对立“基本上是中国的国内问题”，日本“希望这个问题能在当事者之间和平解决”，<sup>①</sup> 承认台海问题为中国的内政。第三，和平友好原则，即“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应该而且可以建立和平友好关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第四，和平解决争端原则，即“两国政府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第五，反对霸权原则，即“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sup>②</sup> 1973 年 3 月，中国驻日大使陈楚和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四郎分别赴任，两国大使馆正式开馆履职。

遵照《中日联合声明》的规定，双方展开缔结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围绕“反霸条款”入约问题，因首相三木武夫的犹豫而延宕，终由福田赳夫首相决断而解决。1978 年 8 月 12 日，在北京举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约仪式。条约的前言明确指出：“《中日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联合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条约重申《中日联合声明》的和平友好、和平解决争端、反对霸权等发展两国关系的三原则，强调“本着睦邻友好的精神，按照平等互利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为进一步发展两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和文化关系，促进两国人民的往来而努力”。<sup>③</sup> 条约的签订，赋予两国睦邻和平友好关系的国际法意义，投放了奠定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又一块基石。

在前述两个文件的指引下，中日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时期。1978—1992 年，两国领导人的来往持续不断。1978 年 10 月，邓小平副总理飞赴东京，出席和约批准书交换仪式并正式访日。1979 年 12 月，大平正芳首相访华，启动日本

<sup>①</sup>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 129 页。

<sup>②</sup> 同上书，第 111 页。

<sup>③</sup> 同上书，第 228 页。

对华政府援助并签订《中日文化交流协定》。1980年5月，国务院总理华国锋访问日本。1981年11月，福田赳夫首相访华，开启福田家族投身两国友好之缘。1982年9月，铃木善幸首相访华。1983年11月，胡耀邦总书记访日。1984年、1986年，首相中曾根康弘两度访华。1988年8月，竹下登首相访华。1989年4月，李鹏总理访日；7月，日本参加西方七国对华制裁，冻结第三批政府贷款，停止高层互访。1990年，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访华，突破政府高层不访华的限制。1991年，海部俊树首相在西方七国中率先实现政府首脑访华。1992年4月，江泽民总书记访日，助推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20年的热潮。概言之，中日高层频繁互访，反映两国关系的热络。究其原因，除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超乎想象的魅力和吸引力之外，中国处于改革开放初期，亟须借鉴日本的经济发 展经验，引进技术和资金；日本则要利用日元升值之机，增加对华投资，大力开拓中国市场。双方高度互补互利的战略需求，迅速拉近了两国距离，加之复交通航后两国交通更加便利，紧密了双方关系。

与此同时，中日官方与民间多层次的交流机制相继建立，为高层互访提供了制度支撑。在官方层面，1980—1987年的八年间，中日每年都召开政府成员会议，就国际形势、两国外交政策、经济政策及中日关系发展等进行深度磋商，成果显著。在民间层面，1982—1988年间，每两年举办一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研讨中日关系、经济合作、加强两国友好关系等议题，形成官民协同推进中日关系发展的架构。1984年，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在东京和箱根举行首次会议，一致同意设立两国关系中长期展望、经济技术交流、青年交流三个专门委员会，为推进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重要平台。

需要提及的是，即使在两国关系热络时期，中日在历史认知、台湾问题等方面仍时有摩擦。如：1982年日本教科书事件、1985年中曾根康弘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国土厅长官奥野诚亮否认侵略责任的“大臣狂言”事件、1986年涉及一个中国原则的光华寮产权归属判决事件以及涉及1987年贸易政治化问题的“东芝机械事件”等。在中国政府的抗议和强烈要求下，日本政府及时加以处理：铃木善幸内阁通过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邻国条款”谈话，修正历史教科书的表述；中曾根承诺不再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奥野诚亮被罢免；日方取消光华寮审判的原告诉讼资格；对“东芝机械”予以理赔，并采取履行合同批准手续等。这些事件的根源在日方，但其通过政治管控和法律手段降低了事态升级的风险，维护了两国关系的友好大局。

可以说，该时期的中日关系整体呈现友好态势，在此大环境下，两国文化



交流快速发展，民间友好也持续深化。1979 年《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签署，人文交流普遍展开，迅速形成了多渠道、多方式的文化交流网络。1980 年《中日科学技术合作协定》的签订，开拓了两国合作的新领域。此外，随着大批在华日本遗孤陆续回国，中国养父母的善举深深感动日本社会。据统计，1980 年日本民众对华亲近感达到峰值，为 78.6%；1982 年虽降至 72.7%，仍首次超过对美国的亲近感（71.4%），中国成为日本最感亲近的国家。<sup>①</sup> 1984 年，应中国邀请，日本 3000 名青年访华，交流场面热烈，许多日本青年因此与中国结缘。

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20 周年，1992 年 10 月日本明仁天皇夫妇应邀访华，并在欢迎宴会上致辞，对侵华战争表示“深感痛心”，期待两国构建“不可动摇的友好关系”，倡导两国青年开展“心灵间的交流”。<sup>②</sup> 在两国两千年交往史上，天皇首次访问中国，为中日复交后 20 年“蜜月期”画上了历史性的句点。

## （二）合作与摩擦并存的成熟时期（1993—2012 年）

所谓“成熟”，主要体现为两大转变：一是交往模式从热络时期的彼此“好奇”或“客气”转向直面分歧的建设性对话；二是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综合国力的逐步提升，日本的俯视优越感逐渐弱化，两国进入平视阶段，形成合作与摩擦并存的新格局。成熟期是一个跨世纪的演进过程，呈现合作与摩擦程度不同的阶段性特征。

### 1. 中日关系在摩擦与合作中走向成熟（1993—2001 年）

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出现诸多摩擦，并非偶然。其一，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关系进入多事之秋，1993 年发生“银河号”事件、1995 年李登辉窜访美国、1995—1996 年台海危机、1999 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以及 2001 年南海撞机事件等冲突。中美关系的摩擦与紧张局势，不可避免地対中日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其二，冷战终结后，中日两国的对外战略选择截然不同。面对国际秩序的重塑，日本背倚美国，以谋其私。1992 年，日本国会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简称“PKO 法”）。1997 年日本与美国签订《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首次引入“周边事态”条款。1999 年日本国会又通过《周边事态法》，强化了针对所谓“周边事态”（隐含台湾问题）的军事威慑力度。上述举动引起了中国的严重关切和高度警觉，影响了双方的政治互信。1992 年，中共

<sup>①</sup> 内閣府大臣官房政府広報室「外交に関する世論調査」、<http://www8.cao.go.jp/survey/index-gai.html> [2025-05-10]。

<sup>②</sup>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 850 页。

“十四大”强调当今世界“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sup>①</sup> 1997 年，中共“十五大”强调“多极化趋势的发展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和繁荣”。<sup>②</sup> 中国倡导世界多极化发展，而日本则在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中选边站。对外战略选择上的分歧，成为两国关系疏离的根本原因。

其三，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各种社会不安因素催生日本的新民族主义抬头。在经济上，1991 年日本经济泡沫破裂，陷入长期停滞与低迷时期。在政治上，1993 年长期执政的自民党在大选中落败，开启了多党联合执政时期。1989—1998 年，竹下登、宇野宗佑、海部俊树、宫泽喜一、细川护熙、羽田孜、村山富市、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等轮流坐庄，“十年九相”。在社会上，1995 年 1 月阪神大地震，造成万余名民众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失，政府反应迟缓引发广泛诟病；3 月，邪教组织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发动沙林毒气袭击，导致 13 人死亡和 6000 余人受伤。此外，养老制度也因经济低迷造成财源紧张而出现动摇。天灾人祸接踵而至，日本社会出现群体性心理恐慌。

局势动荡之下，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兴起，在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上表现出显著的右倾化趋势。一方面，右翼势力试图歪曲历史，为“大东亚战争”正名，替“大日本帝国”翻案，美化侵略。部分媒体乘机推波助澜，鼓吹“对历史问题停止道歉”。另一方面，日本社会的“台湾情结”未因中日邦交正常化而消散，“青岚会”等各种“亲台”右翼团体活动频繁。1997 年“自民党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突破党派界限，扩大为跨党派的“日华议员恳谈会”，成员多达 150 余名，成为日本政界“台湾帮”的最大据点，其活动实质是蓄意挑战和侵蚀一个中国原则。

1995 年，时值二战结束 50 周年。5 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访华，在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时表示“正视并正确认识历史不可或缺”，反省日本“过去对中国等亚洲国家的侵略行为以及殖民统治”。8 月 15 日，村山发表谈话，是日本首相首次在国际场合明确承认侵略并道歉。谈话指出，由于“政策错误”，日本的“殖民统治与侵略”给亚洲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和痛苦，对此表示“沉痛的反省和衷心的歉意”。同日，村山书面回答《人民日报》记者提问，重申“痛切反省由于我国的殖民统治和侵略对中国人民造成巨大损

---

<sup>①</sup>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 年 10 月 12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669 页。

<sup>②</sup>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 年 9 月 12 日），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年，第 913 页。

害和痛苦，对此表示衷心的道歉”。<sup>①</sup>也是在同一天，日本国会通过《以历史为教训重申和平决心的决议》（即“不战决议”），将“侵略战争”淡化为“侵略性行为”，只提“深刻反省”，刻意回避“道歉”或“谢罪”的表述。

同期，在经贸与文化学术交流领域，中日关系的发展则是另一番景象。首先，中日经贸关系快速发展，互利共赢格局稳固。据日方统计，1980—2001 年间，两国贸易总额从 94 亿美元跃升至 892 亿美元，增长近 8.5 倍；1979 年至 1998 年，日本向中国提供了 131.8 亿美元的贷款，其中包括有偿援助 99 亿美元、无偿援助 7.5 亿美元、技术合作 25.3 亿美元。这些政府贷款促进了中日贸易规模持续扩大，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其次，文化学术交流也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学术振兴会、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等机构作用突出。利用充足的研究经费和丰富便利的资料条件，赴日中国学者的学术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另外，得益于日本文部省为中国本科生、研究生提供的奖学金，加上日本各大学、科研机构、社会团体助力，短时间内培养了相当数量的人才。此外，双方通过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学者讲学、组织短期访问与田野调查、互相赠送图书与研究资料等多种方式，逐步形成学术交流网络，成为两国文化交流的宝贵财富。

1998 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20 周年，11 月江泽民主席正式访日。其间，他与明仁天皇夫妇会面，与首相小渊惠三会谈，并广泛接触日本政要及各界老朋友，出席日中友好团体和经济团体联合会举行的招待会，在早稻田大学发表演讲，访问仙台和札幌。会谈后，双方签署《中日联合宣言》，强调“正视过去以及正确认识历史，是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日方遵守在《中日联合声明》中表明关于台湾问题的立场，重申中国只有一个；双方郑重宣布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sup>②</sup>

与《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相比较，《中日联合宣言》表述中的“新”主要包括在三个方面。一是首次写入“侵略”二字，即日方“痛感由于过去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的责任，对此表示深刻反省”，这与“村山谈话”精神一致。二是中方首次明确“对日方迄今向中国提供的经济合作表示感谢”。这一“感谢”体现了中国对日本国民真诚的感情，也回应了部分媒体的不当言论。三是双方首次共同承认两国间存

① 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71—1995）》，第 919、922、933、934 页。

② 《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外交部网，1998 年 11 月 26 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199811/19981126\\_269878.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yxw/199811/19981126_269878.shtml) [2025-05-10]。

在分歧，强调“求同存异”，即通过友好协商妥善处理两国间现存及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和争议。<sup>①</sup> 求同存异，友好协商，表明两国关系进入成熟阶段。

2000 年 10 月，朱镕基总理访问日本，与首相森喜朗会谈。双方一致同意推进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朱镕基还接受日本 TBS 电视台采访，与东京和大阪现场连线的约 120 名日本民众进行直接对话，这“对日本国民了解中国绝对有很大的好影响”。<sup>②</sup>

## 2. 中日关系的冷暖不定（2001—2012 年）

在这一阶段，中日关系呈现摩擦、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特点，波动性显著增强。小泉纯一郎任内中日关系陷入“政冷经热”僵局并出现战略竞争苗头，安倍晋三上台后访华，打破了僵局。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执政时期，两国关系进一步提升，麻生太郎执政时期战略竞争态势加强，菅直人、野田佳彦执政时期两国关系紧张加剧。在此期间，历史问题与钓鱼岛问题凸显，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两大症结，两国民众的相互认知亦持续恶化。

2001—2006 年小泉执政期间，日本对华采取竞争与合作的两手政策。一方面，在东南亚与中国展开区域经济影响力竞争。2001 年 11 月中国与东盟达成十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共识，小泉随即于次年 2 月访问东盟，提出邀请澳、新两国加入“10+3”机制，构建“美国发挥作用”的“东亚共同体”<sup>③</sup>，旨在组建日美澳新合作机制以制衡中国。2003 年，小泉在东京召集柬老泰越缅五国举行湄公河次区域开发（GMS）会议，却把该机制成员国中国排斥在外。另一方面，同年小泉与温家宝、卢武铉签署《中日韩推进三方合作联合宣言》（即《巴厘宣言》），支持三国合作。2004 年 6 月，小泉会见出席第 10 次中日经济讨论会的中方代表团，积极评价中国经济发展对日本经济的拉动作用，表态称“我一直不赞成所谓‘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机遇”。<sup>④</sup> 竞争与合作兼具，凸显了小泉政府对华政策的两面性。2005 年，日本申请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却出版美化侵略的历史教科书，小泉本人则不顾邻国反对，执意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小泉内阁的

<sup>①</sup> 《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外交部网，1998 年 11 月 26 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199811/t19981126\\_269878.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yxw/199811/t19981126_269878.shtml) [2025-05-10]。

<sup>②</sup> 《朱镕基总理魅力倾倒对话的日本民众》，中国新闻网，2000 年 10 月 14 日，<https://www.chinanews.com.cn/2000-10-18/26/51334.html> [2025-05-10]。

<sup>③</sup> 小泉纯一郎「東アジアの中の日本とASEAN」、『毎日新聞』2002 年 1 月 15 日。

<sup>④</sup> 《日本首相小泉：中国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是机遇》，北方网，2004 年 6 月 3 日，<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4/06/03/000795871.shtml> [2025-05-10]。

行径背离常理，引发了中国多个城市的民众举行游行以示抗议。当年“10+3”框架下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也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一度中断。

2006 年 10 月，安倍晋三接任首相后即对中韩两国展开“破冰”之旅，旨在修复因小泉参拜靖国神社而严重受损的邻国关系。其间，中日发表《中日联合新闻公报》，提出了若干新表述：将两国关系定义为“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日方用“正视历史，面向未来”取代了“痛感责任”和“深刻反省”的惯用表述；双方约定在年内启动中日学术界共同历史研究等。<sup>①</sup> 2007 年 4 月，中国总理温家宝回访日本，开启“融冰之旅”，会见天皇，与安倍会谈，并在国会发表演讲，同时广泛接触日本各界人士。双方在《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进一步确认建立“战略互惠关系”，明确其内涵包括“增进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加强防务对话与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好感情”“共同应对地区及全球性课题”等。<sup>②</sup> 12 月，日本首相福田康夫访华，开启“迎春”之旅。双方就胡锦涛访日、推进东海问题磋商等议题达成共识，并签署了《关于“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动的备忘录》。

2008 年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30 周年，5 月胡锦涛访日，践行“暖春”之旅。双方发表了指导两国关系的第四个政治文件，即《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该声明强调：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双方确认继续恪守三个文件的各项原则并全面落实两个联合新闻公报的各项共识；正视历史、面向未来，不断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新局面；确认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日方重申继续坚持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就台湾问题表明立场。双方决定增进政治互信，促进人文交流、增进国民友好感情，加强互利合作，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发展以及共同应对全球性课题。<sup>③</sup>

通过“破冰”“融冰”和“迎春”“暖春”之旅，中日官民互动持续升温。2003 年 3 月抗击非典疫情（SARS）期间，日本政府率先向中国提供 2.05 亿日元的医疗器械紧急援助和 15 亿日元的紧急无偿援助，总额居援助国之首。<sup>④</sup>

① 《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国政府网，2006 年 10 月 8 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453187.htm](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6/content_453187.htm) [2025-05-10]。

② 《中日联合新闻公报》，中国政府网，2007 年 4 月 11 日，[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7/content\\_621243.htm](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07/content_621243.htm) [2025-05-10]。

③ 《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外交部网，2008 年 5 月 7 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0805/t20080508\\_297745.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0805/t20080508_297745.shtml) [2025-05-10]。

④ 《日本政府企业援助中国抗非典》，《中国青年报》2003 年 5 月 12 日，[https://zqb.cyol.com/content/2003-05/12/content\\_660685.htm](https://zqb.cyol.com/content/2003-05/12/content_660685.htm) [2025-05-10]。

2008 年 5 月中国汶川大地震后，日本迅速展开援助行动，首相福田康夫致电慰问，日本政府捐赠 10 亿日元及大量救灾物资，并派出救援队前往灾区。2011 年 3 月东日本大地震后，中国政府也立即派出救援队，并提供 1 亿元资金和 2 万吨燃油物资等。两国在危难时刻携手抗灾，拉近了两国国民的感情。此外，以“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活动为契机，自 2008 年起的四年间，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日本外务省共同推进了每年 4000 人规模的青少年互访计划，有利于两国国民的交流和理解。

2009 年 8 月 26 日，即将就任日本首相的民主党代表鸠山由纪夫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日本的新道路》。该文确认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基石”，强调东亚是“日本生存的基本范围”；认为“美国主导全球的时代正走向终结”，世界正走向多极化；在不远的未来，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日本；日本新道路即东亚的“区域一体化和集体安全”，通过“友爱外交”化解领土争端。<sup>①</sup> 10 月，鸠山在施政演说中强调日本与中韩、东南亚国家应“相互尊重多样的价值观，构筑真正的信赖关系”，“推进实现向其他地区开放的‘东亚共同体’构想”。<sup>②</sup> 中国政府积极回应鸠山由纪夫提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2010 年 5 月，温家宝在第三次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后正式访日，与鸠山会谈。双方强调构筑战略互惠关系，增进战略互信，妥善处理敏感问题，确保和平、友好、合作始终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sup>③</sup> 这次访问的成果丰硕，包括重启政府热线、启动落实“东海共识”的谈判、加快建立两国防务部门海上联络机制、扩大人文交流和人员互访等。

2010 年 6 月 2 日，鸠山由纪夫因普天间美军基地搬迁问题被迫辞职，8 日菅直人组阁。27 日，胡锦涛主席在参加多伦多 20 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见菅直人，他赞赏民主党和日本新内阁重视中日关系，强调中方愿与日方共同把握机遇，在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深化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菅直人表示，新内阁愿同中方一起丰富两国关系战略内涵，深化交流合作，共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妥善处理两国关系发展中出现的问题。<sup>④</sup>

① Yukio Hatoyama, “A New Path for Japan”, *New York Times*, August 26, 2009.

② 《鸠山发表首次施政演说 要让日本做东西方沟通桥梁》，环球网，2009 年 10 月 26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9CaKrnJmzEu> [2025-05-10]。

③ 《温家宝 31 日在东京同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举行会谈》，中国政府网，2010 年 5 月 31 日，[https://www.gov.cn/ldhd/2010-05/31/content\\_1617443.htm](https://www.gov.cn/ldhd/2010-05/31/content_1617443.htm) [2025-05-10]。

④ 《胡锦涛会见日本首相菅直人》，外交部网，2010 年 6 月 27 日，[https://www.fmprc.gov.cn/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xgxw\\_676842/201006/t20100627\\_9301444.shtml](https://www.fmprc.gov.cn/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36/xgxw_676842/201006/t20100627_9301444.shtml) [2025-05-10]。

就在中日关系显现积极发展前景之际，钓鱼岛争端骤然激化，强烈刺激了两国民众的感情，导致两国关系出现严重波折。2010 年 9 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海域冲撞中国渔船“闽晋渔 5179 号”并强行扣押船员，甚至企图依据日本国内法来处置。此举严重损害了中方权益，经中方严正交涉，日方最终以对船长“处分保留”的形式释放船长和船只。此“撞船”事件对两国政治互信与国民感情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冲击。

2011 年 8 月 26 日，菅直人因东日本大地震后救灾不力而被迫辞职。9 月 2 日，野田佳彦组阁并举行记者招待会。野田明确表示，将日美同盟定位为外交基轴，与中国“发展战略互惠关系”，承诺在其任期内内阁成员均不正式参拜靖国神社。<sup>①</sup> 12 月 25 日野田应邀访华，与温家宝总理举行会谈。双方共同回顾了中日关系发展的若干原则和方向，期待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 40 周年纪念活动。温家宝强调：“中日要做好邻居、好伙伴，不要做对手。”野田希望深化日中战略互惠关系，表示增进政治互信是发展两国关系的重要基础，认为中国的发展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际社会是机遇。<sup>②</sup> 会谈时双方均未提及的钓鱼岛问题，在数月后再度发酵。2012 年 4 月，右翼大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以所谓“政府租约即将到期”为由，煽动集资“购岛”。约 25 万网民参与所谓“投票”，其中 92% 表示支持。<sup>③</sup> 9 月，本就对钓鱼岛问题持强硬立场的野田佳彦，不顾中方多次严正警告，宣布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并将其非法“国有化”。对此，中国政府坚决反制，采取公布领海基线、海监船维权巡航等措施，宣示中国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北京、西安、长沙、重庆等多个城市的民众自发举行游行，抗议日本政府“国有化”钓鱼岛行径。日本媒体借机炒作，致使中日关系在短暂回暖后急剧恶化。

### 三、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2013 年至今）

2012 年 12 月 26 日，日本自民党与公明党联合组阁，安倍晋三再次出任

① 《野田内阁总理大臣记者招待会》，日本国首相官邸网，2011 年 9 月 2 日，<https://www.kantei.go.jp/cn/noda/statement/201109/02kaiken.html> [2025-05-10]。

② 《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举行会谈》，中国政府网，2011 年 12 月 25 日，[https://www.gov.cn/ldhd/2011-12/25/content\\_2028923.htm](https://www.gov.cn/ldhd/2011-12/25/content_2028923.htm) [2025-05-10]。

③ 《日本“购岛”争端始末》，观察者网，2012 年 9 月 11 日，[https://www.guancha.cn/Neighbors/2012\\_09\\_11\\_97017.shtml](https://www.guancha.cn/Neighbors/2012_09_11_97017.shtml) [2025-05-10]。

首相。在 2013 年 1 月的施政演说中，安倍表示将以建设“强大日本”为目标，应对经济、震后复兴、外交与安全保障、教育等四大“危机”。<sup>①</sup> 通过实施货币宽松政策、扩大政府财政投入、推进企业结构性改革等举措，刺激内需、拉动出口，促使国内经济形势好转，股市大幅上涨。同时，内阁支持率升至 60% 左右，为安倍施政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在外交上，安倍政府全力支持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协同美国合力打造排斥中国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安倍重提五年前访印演说《两洋交汇》中“自由与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外交的旧话，强调“以紧密的日美同盟为基轴，加深与澳大利亚、印度、东盟各国等亚洲海洋诸国的合作”，扩展“自由繁荣之弧”。<sup>②</sup> 同时，对华采取强硬立场，将中国在钓鱼岛海域正当维权说成是“中国威胁论”，坚称所谓“尖阁诸岛”（即中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断言“不存在需解决的主权争议问题”。<sup>③</sup> 安倍还在历史问题上不断挑衅，他试图用“安倍谈话”取代“村山谈话”、在国会抛出“‘侵略’定义未定论”、坐在编号为“731”的战机里摆拍、以公职身份参拜靖国神社等。

就在安倍多方布局之际，中国提出自己的对外战略构想。2012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sup>④</sup> 2013 年 9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发表的演讲中，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强调“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sup>⑤</sup> 10 月，习近平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提出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共同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sup>⑥</sup> 提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中国主动向世界宣示“一带一路”倡议，各国反响强烈。而且，在 2010 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基础上，2013 年的中国 GDP 已达 9.57 万亿美元，是日本（4.92

① 安倍晋三：《第 183 届国会安倍内阁总理大臣所信表明演说》，日本国首相官邸网，2013 年 1 月 28 日，[https://www.kantei.go.jp/cn/96\\_abe/statement/201301/28syosin.html](https://www.kantei.go.jp/cn/96_abe/statement/201301/28syosin.html) [2025-05-10]。

② 同上。

③ 安倍晋三「施政方針演説」、『毎日新聞』2013 年 3 月 1 日。

④ 《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国政府网，2012 年 11 月 17 日，[https://www.gov.cn/ldhd/2012-11/17/content\\_2268826\\_7.htm](https://www.gov.cn/ldhd/2012-11/17/content_2268826_7.htm) [2025-05-10]。

⑤ 《习近平：创新合作模式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人民网，2013 年 9 月 7 日，<http://cpc.people.com.cn/xuexi/n/2013/0907/c164113-22840646.html> [2025-05-10]。

⑥ 《习近平：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新华网，2013 年 10 月 3 日，[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3-10/03/c\\_125482056.htm](https://www.xinhuanet.com/world/2013-10/03/c_125482056.htm) [2025-05-10]。



万亿美元)的 1.9 倍。<sup>①</sup> 中国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长,为落实“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中日之间的博弈,也因此而在更高阶段的平台上持续展开。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建设的逐步推进,安倍对华继续采取两手政策。一方面,日本与美国持一致立场,抵制“亚投行”。2014 年 5 月,安倍在香格里拉对话的基调报告中强调“日美同盟是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宣布将日澳关系“提升到新的特别关系”,并宣称日印合作将“给太平洋与印度洋交汇之地带去和平与繁荣”。<sup>②</sup> 该报告强调美日澳印四方联动,构建“印太战略”以针对中国。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现实的民族主义者,安倍不得不承认两国关系的重要性,“要求中方回归‘战略互惠关系’这一原点,避免因个别问题影响整体关系”,并强调“对话的大门一直敞开着”。<sup>③</sup> 2014 年 7 月,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密访北京,为破解中日关系僵局探路。9 月,两国防务部门重启已中断两年的海上联络机制。11 月 7 日,国务委员杨洁篪与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谷内正太郎达成《中日四点原则共识》,即双方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发展战略互惠关系;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克服影响两国关系的政治障碍;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双方同意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sup>④</sup> 安倍在出席 11 月 APEC 北京会议期间,与习近平举行会谈时表示,日方愿意落实双方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以此为新起点,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表示将继续坚持以往历届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认识。<sup>⑤</sup>

自此,中日两国打破僵局,进入改善关系的三年爬坡期。历史问题在领导人会晤中被首先提及。2015 年 4 月,习近平在雅加达亚非领导人会议期间会见安倍时强调,历史问题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要求日方发出正视历史

① 《世界银行发布 2013 年世界发展指标》,2013 年 4 月 18 日, <https://www.shihang.org/zh/news/press-release/2013/04/18/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013-released.print>[2025-05-10]。

② 《安倍总理大臣基调演讲——第 13 次 IISS 亚洲安全保障会议(香格里拉对话)》,日本国首相官邸网,2014 年 5 月 30 日, [https://www.kantei.go.jp/cn/96\\_abe/statement/201405/0530spee.ch.html](https://www.kantei.go.jp/cn/96_abe/statement/201405/0530spee.ch.html)[2025-05-10]。

③ 安倍晋三「施政方針演説」、『毎日新聞』2013 年 3 月 1 日。

④ 《中日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外交部网,2021 年 7 月 13 日, [http://www.cidca.gov.cn/2021-07/13/c\\_1211238463.htm](http://www.cidca.gov.cn/2021-07/13/c_1211238463.htm)[2025-05-10]。

⑤ 《习近平会见参加 APEC 会议 5 经济体领导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 年 11 月 11 日。

的积极信号。安倍回应称，日本政府将继承包括“村山谈话”在内的历史认识立场。<sup>①</sup> 11 月，李克强在首尔出席第六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会见安倍，重申必须遵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精神，切实正视和反省历史。安倍表示，愿坚定不移地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立足于对二战的深刻反省，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sup>②</sup>

中日关系在“爬坡”过程中，还面临着各种干扰。2016 年，安倍内阁继续抵制“亚投行”，反对中国在南海填海造岛，纵容“台独”分子李登辉窜访日本。7 月，在乌兰巴托举行的亚欧会议期间，李克强会见安倍，指出中日关系改善受到一些复杂因素的干扰，希望日方不要炒作和介入南海问题，也要防止在东海问题上误解误判和局势升级。安倍承认中日关系存在困难，表示要妥善管控分歧，致力于建立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推动两国关系改善与发展。<sup>③</sup> 在 9 月举行的 G20 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在与安倍会谈时指出，当前两国关系正处于爬坡过坎、不进则退的关键阶段，强调双方要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减少两国关系发展的“绊脚石”。安倍表示，愿努力同中方建立互信，按照有关共识精神，就相关问题同中方保持对话。<sup>④</sup>

2017 年 5 月，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率团参加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受到中方欢迎。7 月，G20 峰会在德国汉堡举行，习近平与安倍再次举行正式会谈。<sup>⑤</sup> 这一年，中日关系改善步伐明显加快，这既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包括日本带来合作共赢的机遇密切相关，也与特朗普政府不按规则行事、执意推行单边主义的“美国优先”政策有关。为拓展对华经贸合作利益、增加对美交涉筹码，安倍政府转而采取“由竞争转为协调”的对华新方针，助力两国关系的发展。

2018 年时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40 周年，两国领导人互访频繁，

<sup>①</sup>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政府网，2015 年 4 月 22 日，[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5-04/22/content\\_2851510.htm](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5-04/22/content_2851510.htm) [2025-05-10]。

<sup>②</sup> 《李克强会见安倍晋三 就中日韩合作提六条建议》，人民政协网，2015 年 11 月 2 日，<https://www.rmzww.com.cn/c/2015-11-02/611283.shtml> [2025-05-10]。

<sup>③</sup> 《李克强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外交部网，2016 年 7 月 15 日，[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6nzt/lkqfwmgbcx\\_d\\_687186/zxxx\\_687188/201607/t20160715\\_9281863.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6nzt/lkqfwmgbcx_d_687186/zxxx_687188/201607/t20160715_9281863.shtml) [2025-05-10]。

<sup>④</sup>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政府网，2016 年 9 月 5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6-09/05/content\\_5105582.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6-09/05/content_5105582.htm) [2025-05-10]。

<sup>⑤</sup>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政府网，2017 年 7 月 8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7-07/08/content\\_5208947.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7-07/08/content_5208947.htm) [2025-05-10]。

“爬坡”登顶。5 月，李克强总理正式访日并与安倍会谈，希望日方正视和反省历史，信守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开展“一带一路”合作，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使国家关系重回正常轨道。安倍表示，日方致力于落实战略互惠关系，构筑更加成熟的日中关系；日方仅同台湾保持民间往来，同中方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sup>①</sup> 9 月，习近平会见安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深化互利合作提供了新平台和试验田，夯实了两国关系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安倍避而不谈“一带一路”合作，但表示中日关系正回到正常轨道，愿同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增进两国民间友好。<sup>②</sup> 10 月，安倍正式访华，与李克强会谈，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出席首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并致辞。在与习近平会谈时，安倍表示此访将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日中关系新时代，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建设，称赞“一带一路”是有潜力的构想。<sup>③</sup> 11 月 30 日，习近平在出席布宜诺斯艾利斯 G20 峰会期间再次会见安倍，强调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基础上，共同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安倍则认为中日关系进入了新阶段。双方表示将早日谈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sup>④</sup>

2019 年 2 月春节期间，东京塔点亮“中国红”，安倍通过视频向中国人民拜年。5 月 1 日德仁天皇即位，年号“令和”。6 月 27 日，习近平在出席大阪 G20 峰会期间与安倍会谈，首次倡议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为中日互利合作开辟了广阔天地，欢迎日方积极参与”。安倍表示，本着“化竞争为协调、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愿同中方继续共同努力，构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sup>⑤</sup> 12 月 23 日，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安倍，从百年变局、全球治理和全球视野等视角阐释契合新时代要求的意义。安倍表示，日方愿同中方密切沟通，构建契合新

① 《李克强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外交部网，2018 年 5 月 10 日，[https://www.fmprc.gov.cn/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8nzt/lkqcf0506\\_692295/zxxx\\_692297/201805/t20180510\\_9280770.shtml](https://www.fmprc.gov.cn/ziliao_674904/zt_674979/ywzt_675099/2018nzt/lkqcf0506_692295/zxxx_692297/201805/t20180510_9280770.shtml) [2025-05-10]。

②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新华网，2018 年 9 月 12 日，[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9/12/c\\_1123418691.htm?tdsourcetag=s\\_pcqq\\_aiomsg](https://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9/12/c_1123418691.htm?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2025-05-10]。

③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政府网，2018 年 10 月 26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8-10/26/content\\_5334807.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8-10/26/content_5334807.htm) [2025-05-10]。

④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政府网，2018 年 12 月 1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8-12/01/content\\_5344975.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8-12/01/content_5344975.htm) [2025-05-10]。

⑤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政府网，2019 年 6 月 27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9-06/27/content\\_5403960.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9-06/27/content_5403960.htm) [2025-05-10]。

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推进第三方市场合作。<sup>①</sup> 25 日，李克强出席成都中日韩领导人会议期间，与安倍会谈时强调，中日应不断实现新的发展，加强投资、创新、第三方市场等领域合作，夯实两国关系发展的民意基础，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安倍表示，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共同开创日中关系新时代；表示日方愿推动尽快签署高水平的 RCEP，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sup>②</sup>

2020 年 1 月中国出现新冠疫情，日本社会各界积极行动，向武汉捐赠了大量医疗物资。大阪街头的“武汉挺住”标语、东京女孩募捐等画面以及华春莹“衷心感谢，铭记在心”的回应，生动体现了两国守望相助的情谊。与此同时，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推行“印太战略”，狂打“台湾牌”，支持“港独”“疆独”，借口新冠疫情、抹黑中国。中美关系全面紧张，直接影响着日本的对华政策。2020 年 9 月 16 日，菅义伟出任首相。他在 25 日的首脑通话时表示，日方把两国关系视为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稳定的日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对世界和平繁荣亦不可或缺。<sup>③</sup> 10 月 16 日，菅义伟发表施政演说，认为中日两国之间的稳定关系至关重要，希望通过高层交流，在共同课题上开展合作。<sup>④</sup>

2021 年 1 月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继续推行“印太战略”，重建与日欧等盟友关系，坚持价值观划线与经贸政治化。3 月，拜登主持美日澳印“四方安全对话”（QUAD）峰会，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并推动成立美英澳三边安全联盟（AUKUS）。菅义伟出席了 QUAD 会议。同时，日美外长防长“2+2”会谈时隔八年重启，其联合声明涉台涉疆，指责中国“挑战国际秩序”。对此，中方对美日展开严正交涉。<sup>⑤</sup> 4 月，菅义伟率先拜会拜登，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日美同盟的“基石”作用，借“打造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之名，干涉中国内政，引发中方强烈抗议。9 月 23 日，菅义伟在下野前夕再度赴美参加

①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国政府网，2019 年 12 月 23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9-12/23/content\\_5463369.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9-12/23/content_5463369.htm) [2025-05-10]。

② 《李克强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中国政府网，2019 年 12 月 25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19-12/25/content\\_5464052.htm](https://www.gov.cn/xinwen/2019-12/25/content_5464052.htm) [2025-05-10]。

③ 《习近平同日本首相菅义伟通电话》，中国政府网，2020 年 9 月 25 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0-09/25/content\\_5547270.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0-09/25/content_5547270.htm) [2025-05-10]。

④ 《菅义伟发表就任后首次施政演说：中日关系至关重要》，环球网，2021 年 10 月 26 日，<https://world.huanqiu.com/article/40RT8rcciuc> [2025-05-10]。

⑤ 《美日发布联合声明 外交部回应：敦促美日立即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央广网，2021 年 3 月 18 日，[https://news.cnr.cn/dj/20210317/t20210317\\_525439058.shtml](https://news.cnr.cn/dj/20210317/t20210317_525439058.shtml) [2025-05-10]。

QUAD。菅义伟执政一年，屡屡违背对华承诺，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发展。10月4日，岸田文雄组阁。8日，习近平在与岸田通话中强调，愿同日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中日要认真汲取正反两方面经验，维护好两国关系政治基础和大局。岸田表示，愿同中方一道，从中日关系历史中汲取重要启示，共同努力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sup>①</sup>同时，岸田政府又实施了多项对华“经济安全保障”政策，严格限制日本半导体部门与中国企业往来，仅维持一般性的中日经贸关系。同年12月，已经下野的安倍在台湾智库线上会议发表演讲，声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也就是“日美同盟有事”，<sup>②</sup>暴露了右翼政客的真面目。

2022年11月17日，习近平出席曼谷 APEC 第 29 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与岸田会晤时重申，中方愿同日方一道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强调在历史、台湾问题上应恪守已经达成的原则共识；实现更高水平优势互补和互利共赢。岸田表示，双方已就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日中关系达成一致；日本的发展繁荣离不开中国，反之也同样；日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承诺没有丝毫变化。<sup>③</sup>2023年11月17日，在旧金山第30次 APEC 会议期间，习近平再次会见岸田，双方重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和共识，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sup>④</sup>但是，2024年4月，岸田访美期间宣布日本加入 AUKUS。他在美国国会演讲时奢谈“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宣称中国对日本乃至全球构成“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将引发东亚地区的新危机；表示日本正进行历史性的军事升级，以支持其盟友。<sup>⑤</sup>受到岸田内阁强硬立场刺激，日本右翼议员组成了所谓“渔业调查团”，乘坐渔船强闯钓鱼岛海域。中国海警迅速出动四艘执法船跟踪监视并予以驱离。10月1日，因“黑金”丑闻，岸田内阁辞职。

2024年10月4日，新任首相石破茂在日本国会发表施政演说表示，将继

① 《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电话》，中国政府网，2021年10月8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08/content\\_5641399.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1-10/08/content_5641399.htm) [2025-05-10]。

② 《妄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被中方痛批，安倍不知悔改又上电视“表演”》，环球网，2021年12月8日，<https://3w.huanqiu.com/a/c36dc8/45tupU3uKO5> [2025-05-10]。

③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国政府网，2022年11月18日，[https://www.gov.cn/xinwen/2022-11/18/content\\_5727646.htm](https://www.gov.cn/xinwen/2022-11/18/content_5727646.htm) [2025-05-10]。

④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中国政府网，2023年11月17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1/content\\_6915827.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11/content_6915827.htm) [2025-05-10]。

⑤ 《岸田文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大肆鼓吹中国是“全球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观察者网，2024年4月12日，[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4\\_04\\_12\\_731377.shtml](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24_04_12_731377.shtml) [2025-05-10]。

续推进与中国的战略互惠关系，与中方共同打造“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sup>①</sup> 11月5日，特朗普再度当选，重新对华打压、向盟友施压、破坏国际规则和秩序。11月15日，习近平出席在秘鲁首都利马举行的第31次APEC会议期间，与石破茂会谈。习近平指出，国际和地区形势变乱交织，中方愿同日方一道，按照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和方向，坚守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重要共识，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石破表示，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和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对于地区和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日方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和共识，愿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坦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和互信；在台湾问题上，日方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sup>②</sup> 较之岸田内阁，石破茂内阁对华政策有所回调。

同年12月25日，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北京同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举行会谈。关于如何践行“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中方提出六大要点，即校准战略认知、维护双方互信、加强沟通对话、坚持合作共赢、加强人文交流、妥善处理分歧。对此，岩屋毅表示，在历史问题上，日方继续秉持“村山谈话”精神，深刻反省和由衷道歉；在台湾问题上，日方恪守《中日联合声明》原则，尊重并理解中方立场。他强调，中日关系改善对两国是战略机遇，对亚洲乃至世界具有重要意义；日方愿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构建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sup>③</sup>

2025年4月23日，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会见日本公明党党首齐藤铁夫；4月29日，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在北京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自民党干事长森山裕。在这两次会见中，中方均强调要“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建设性、稳定的中日关系”。日方的回应耐人寻味。森山表示“全面推进日中战略互惠关系是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齐藤则强调“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sup>④</sup> 双方表态各有侧重，但若能践行，则不啻中日两国和世界之福。

<sup>①</sup> 《日本首相石破茂发表施政演说》，中国新闻网，2024年10月5日，<https://tv.cctv.cn/2024/10/05/VIDEfxltySdUR8tJLxS0Ls241005.shtml> [2025-05-10]。

<sup>②</sup>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石破茂》，中国政府网，2024年11月16日，[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1/content\\_6987502.htm](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11/content_6987502.htm) [2025-05-10]。

<sup>③</sup> 《王毅同日本外相岩屋毅会谈》，外交部网，2024年12月25日，[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_673089/xghd\\_673097/202412/t20241225\\_11518526.shtml](https://www.fmprc.gov.cn/web/wjzb_673089/xghd_673097/202412/t20241225_11518526.shtml) [2025-05-10]。

<sup>④</sup> 参见：《王沪宁会见日本公明党代表团》，外交部网，2025年4月23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504/t20250423\\_11602326.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504/t20250423_11602326.shtml) [2025-05-10]；《赵乐际会见日本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自民党干事长森山裕》，外交部网，2025年4月29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504/t20250429\\_11609063.shtml](https://www.mfa.gov.cn/web/zyxw/202504/t20250429_11609063.shtml) [2025-05-10]。

综上,进入 21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国际舞台,“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的创设,一举扭转了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被动回应国外区域化构想的局面,呈现前所未有的新态势。随着中日经济总量差距持续扩大和两国竞相提出国际经济开发的倡议与构想,中日关系进入近代以来真正对等合作、共谋发展的全新阶段。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正是两国关系发展的关键所在。

#### 四、结 语

回望战后 80 年中日关系的发展历程,以下几点值得关注。第一,中日关系的发展演变中,官方与民间两个层面互相作用,呈现不同的特点。复交前,民间交流率先启动,发挥了“以民促官”的作用,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复交后,民意基础制约外交,是反映国家关系的晴雨表。虽然两国的国情、政情存在差异,民意、民心的表达方式有所不同,但均受高层引领和媒体导向的影响。如何提升民众彼此观感,是一个重要但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课题,尚需解构旧的认知框架、构筑契合新时代要求的认知新架构。

第二,中日复交以来,官方关系特别是高层引领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落实“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依然需要高层战略引领。两国关系的冷暖波动,取决于在历史、台湾、钓鱼岛等诸多问题上,日本政府能否恪守指导两国关系的四个政治文件所确立的原则和共识。2025 年 3 月,日本首相石破茂宣称《中日联合声明》“不具备法律效力”的错误言论,更从反面印证了四个文件举足轻重的意义。换言之,中日关系面临的挑战源自日方而非中方。当然,日本政府内部也非铁板一块,其对华政策往往因时因人而异。内阁调整往往是调整对华外交政策的拐点,形成“钟摆效应”。

第三,21 世纪特别是最近十余年的实践表明,中日关系依旧是内容丰富的多面体,呈现结构性矛盾的特点。其中,国家对外发展战略层面的博弈,已构成制约国家关系的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构建战略互惠关系、管控敏感问题、坚持平等互利与合作共赢,是中日两国唯一的明智选择。与此同时,中日关系又是一组极易受到其他国际要素、特别是美国因素影响的双边关系,并经常呈现多边性、复杂性的特点。审视中日关系需要理论支撑,从研究矛盾的变量性、恒量性切入,探究矛盾转化与如何转化的条件、过程和结果,为理性思考中日关系提供思路。回顾二战后 80 年中日关系的演进历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自然水到渠成。

(责任编辑:李璇夏)

and led a series of postwar reforms spanning the political,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spheres, profoundly shaping Japan's modernization process. Over the past eighty years, scholarly research on this subject has undergone a significant evolution—from early efforts to justify occupation policies, to critical interpreta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more recently, to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integrating various fields. The studies conducted during the three different periods exhibit distinct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es at each stage. Accordingly, the limitations of existing research and potential future directions merit further reflect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 renewed examination of the U. S. occupation's long-term impact on Japan's social structure, democratization, and bilateral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can contribute to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configuration of the postwar East Asian order.

### **The Transformation of Postwar Japan's "Pacifism": Ideas, Institutions and Practices**

*Tian Qingli*

Over the eighty years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Japan's "pacifism"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and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 In terms of ideology,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postwar Japan has gradually shifted from the Cold War-era doctrine of "one-country pacifism" to a posture of "proactive pacifism". Institutionally, conservative politicians have sought to reinterpret the Constitution in ways that would facilitate Japan's transformation from a "peace state" into a "state capable of warfare". In terms of practice,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of grassroots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movements and peace activities among ordinary citizens have evolved—from the collectivized, organized, and professionalized forms of the Cold War period to more decentralized, individualized, and fragmented patter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Overall, Japan's postwar pacifism has shown a clear trajectory from flourishing to decline, with "proactive pacifism", which emphasizes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capabilities, now dominating the political mainstream. A thorough analysis of the underlying causes behind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postwar Japanese pacifism, along with a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ternal mechanisms that shaped Japan's identity as a "peace state", and a focused examination of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drivers behind Japan's growing tendency toward becoming a military power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can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and analytical foundations for assessing Japan's future national trajectory.

### **Eighty Years of Postwar China-Japan Relations: Government-Public Interaction and High-Level Leadership**

*Song Chengyou*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 1945, China and Japan have undergone a full 80-year journey of postwar development in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Japan's defeat and surrender in 1945,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and the end of the Allied occupation in 1952—with Japan regaining its sovereignty and foreign policy—together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ties. From 1952 to 1972, China-Japan relations experienced three ups and downs over two decades, driven primarily by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that eventually led to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1972 and 1992, bilateral relations entered a period of comprehensive growth marked by multifaceted cooperation and mutual benefit. From 1993 to 2012, discordant elements in the relationship grew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the two countries entered a mature phase characterized by frequent frictions and efforts to seek common ground while shelving differences. Since 2013, amid the backdrop of profound global transformations unseen in a century, China'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have provided a broader stage. How to shape bilateral relations that meet the demands of this new era has become a pressing issue on the agenda.